

## 伊阿诺斯，或双头鹰

——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

刘文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100732)

**提 要:**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是俄国文学和文化史中一根贯穿的红线, 本文对两派思想斗争的历史和起因作了考察, 对两派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对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探究, 旨在说明这两种思想倾向的长期对峙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分裂、俄国文化中的东西对立状态之间互为因果的有趣关系。

**关键词:** 俄国文学; 俄国文化; 斯拉夫派; 西方派

**中图分类号:** H021

**文献标识码:** A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赫尔岑在《往事与沉思》中提及俄国文化中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时这样说。俄文工具书中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定义的第一句话大致都是：19世纪40—50年代俄国的社会—哲学思想流派。也就是说，均强调这是两股出现于19世纪中叶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一个文化、思想史流派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确是在19世纪30—40年代之交正式形成的。然而，作为俄国文化史和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两种思潮、两种文化倾向，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发生最激烈的碰撞却是在19世纪40—50年代，而在此前和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这两种思想倾向之间都一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对峙。不能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看成是俄国历史中一个独立的、短暂的文化现象，这两种思潮的对立和转换、渗透和交融，实际上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种思想倾向的分野，我们至少可以追溯至16世纪，在俄国一些最有价值的古代文献中，我们分明可以感觉到注重东方和倾向西方这两种思潮由来已久的对峙。这里仅举两部文献为例。

在16世纪中期爆发的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公爵的书信之争中，就包含着关于东、西两种不同政权体制、不同发展道路和不同宗教传统的争论。伊凡四世在致库尔勃斯基的信中，不仅痛斥了库尔勃斯基及其叛国行为，同时也谴责了库尔勃斯基所投靠的“西方”；而库尔勃斯基在致伊凡四世的信中，竭力把自己塑造为“一位优雅的西方文化的代表”。(Я. С. Лурье 1993: 214) 有意无意之间，伊凡四世和库尔勃斯基两人似乎成了两种文化、两种宗教势力的体现者和代言人。伊、库两人的书信争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在其发展初期面对东、西两种文化时艰难抉择的一种窘境，同时也构成了俄罗斯文化史上两种不同思

想倾向和价值取向长期对峙的内在动力之一，于是，伊、库之争也就可以被我们视为 19 世纪中叶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争的一个遥远的先声。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论及伊、库之争时，就曾将伊凡四世的体制定义为“东方意义上的专制政权”，并在将其与西欧，尤其是法国的君主制度做了比较之后，指出了伊凡四世革新的局限性及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而库尔勃斯基，“虽然他毫无疑问是保守的，”却“没有奴才的情绪”，也就是说，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西方的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Г. В. Плеханов 1925: 191-192）由此可见，早在两种价值取向出现碰撞的初期，两者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就已经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的态势。

到了 17 世纪中叶，阿瓦库姆及其《生活纪》<sup>1</sup> 又为我们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分裂、俄罗斯文化中的东西对峙提供了某种参照。阿瓦库姆的《生活纪》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作为一部宗教文献，它首先是俄国 17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大牧首尼康于 1652 年在俄国开始推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俄国社会的一次大分裂（Раскол）。俄国教会追求东正教世界主导地位的企图虽然在教会内外都获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在面对拉丁化的西方宗教和世俗世界的态度、在通过何种途径谋得俄国的正教领袖角色等问题上，教会内外的人士却逐渐分裂成两大阵营。以尼康及其继任者和追随者为代表的官方教会人士，主张通过改革教会礼仪、修订经书等方式谋得与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接轨”，并进而谋得中心位置；而以阿瓦库姆为代表的俄国分裂教派，则主张捍卫俄国传统宗教礼仪的神圣性和俄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并以此来彰显俄国教会的纯洁和正宗。在谋求俄国和俄国教会的强大这一点上，官方教会和分裂教派本无根本性的差异，但是对其实现方式的不同认识，竟然会导致两种观念如此尖锐的对立，如此激烈的对抗，回顾俄国历史上每一次价值取向上的东、西之争，其模式和情景，也大致都是如此。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激烈争论，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之后暂时缓和下来，农奴制问题的解决，客观上使两派同时失去了争论的主要焦点。但是，俄国社会中两种价值取向的对峙，却并没有随着农奴制的取缔而结束，而一直或明或暗地持续了下来。

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随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为代表的“土壤派”理论的逐渐成熟，俄国社会上出现了一片反对和清算 40—50 年代的“虚无主义”的呼声，斯拉夫主义的势力似乎一时间有所壮大。但由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塑造的“新人”形象及其代表的新的“子辈”，由赫尔岑所倡导的“俄国式社会主义”，与俄国社会向西方寻求理性精神和理想社会模式的大背景相呼应，很快就又使得俄国的社会思潮向西转了。在两个世纪之交的白银时代，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格尔申宗、司徒卢威、弗兰克等为代表的“路标派”，第一次提出了俄国要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想，这可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但也可能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一个坚持、强调自己独特性的民族，如果不能在某一个范畴获得霸主的地位，另辟蹊径、另立山头就是一个必然的出路了。

在整个苏联时期，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东方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居然获得了相当持久、和谐的结合，苏联社会中的东西之争反而平息下来；一个传统的欧洲列强，突然被视为东方阵营的首领，被柏林墙挡住去路的俄国式社会主义洪流，却滚滚向东倾泻而来，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次民族文化取向的大转折中，却反而很少有东西抉择的两难心态的体现。究其原因，或许有这样几个：首先，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使不同思想倾向的争论变得不太可能，甚至连产生某种思想倾向的前提都不再存在了。其次，在东方阵营赢得的老大哥地位，暂时满足了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大国理想，在面对西欧列强时常常流露出的局促，甚至自卑的民族心理，如疾风中的一片乌云那样迅速地飘逝了，洋溢在整个民族中的乐观情绪，让人们不再愿意纠缠于那些伤脑筋的抉择问题。最后，苏维埃国家庞大的红色疆土横亘在欧亚之间，本身就构成一个东西方的合成体，国境之内的东西方的和睦共处，甚至相互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俄国人心目中的东西文化裂痕。总之，俄罗斯民族所面临的东西方文化矛盾问题，

在整个苏维埃时期都没有激起大的争论，没有什么激烈的爆发。

苏联的解体，显然是一个放弃一种意识形态、选择另一种意识形态的举动，但是在这个放弃—选择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和摇摆。现在的多数俄国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解体前后的全盘西化无疑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妥当的，模仿美国体制进行的民主化和私有化改革，并没有使俄国迅速转变为西方阵营中的平等一员，反而使其国力衰落，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其世界影响也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解体之后俄国国内一时惨不忍睹的局面，实际上是对西方派及其学说的一个嘲讽，一个打击；那么，走另一条路会怎么样呢？历史不可能给俄国人重新尝试一次的机会，但普京当政以来的一系列举措，显然是在矫正最近十余年来的激进和冒进。与普京的政治举措不谋而合的是，在思想、文化界有一些人也进行这种矫正，或者说是在进行更为冷静的思考：比如，索尔仁尼琴的“新斯拉夫主义”；比如，利哈乔夫关于俄国的“北方属性”的观点。就连一些新生代的现代派作家，对这个问题也有所涉猎，维克多·佩列文在为中文版《“百事”一代》所写的《致中国读者》中曾说，“俄罗斯的‘西方’打一开头就是一个虚拟之物，这是某种抽象的物质天堂，通向它的道路就是犯罪性的富裕方式。”（维·佩列文 2001：2）

最近，一本题为《西方派和民族派：对话能否进行？》的新书在俄罗斯出版，这部厚达475页的论文集，是由“自由使命”和“社会舆论”两个基金会共同组织的一次热烈、持久的网络讨论的书面结果。这场讨论本身就表明，东西两种文化取向的对峙还存在于当下的俄罗斯，并且可能将长期地存在下去。

## 二

1836年秋，恰达耶夫发表了著名的《哲学书简》，《书简》中提出的主要命题就是：俄罗斯没有自己值得炫耀的历史，对人类和世界没有任何贡献，她必须在一切方面向西方看齐，接受西方的文明，否则就将没有自己的未来。《书简》在俄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官方对他的理论加以痛斥，宣布他是个“疯子”；而在知识界和文化界，他的观点虽然激起了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感，但也赢得了一部分人明里或暗里的喝彩，当时被流放在维亚特卡的赫尔岑就曾称恰达耶夫的书信是“黑夜的枪声”。（亚·赫尔岑 1998：51）俄国知识界的争论激情被《书简》点燃，首先是在莫斯科的几家沙龙里，关于《书简》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逐渐形成两大阵营，接下来，两派的活动家们又纷纷发表文章，兴办杂志，举行讲座，阐发、宣传各自的观点，终于形成了俄国文化史上一个罕见的百家争鸣局面。可以说，恰达耶夫的《书简》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争的导火索，是俄国思想分野的开端。

《书简》的出现，原本就是一些历史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与俄国当时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的。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的胜利，使得俄国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欧洲强国，是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拯救者”和“解放者”，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但是，在目睹了西欧的生活现状之后，对比俄国的现实，一部分清醒的“解放者”的思想却被触动，这种感情被表达为这样一句话：“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把镣铐留给了自己。”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只属于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而胜利之后的喜悦和自豪则相当长久地存在于俄国统治阶层和很多普通人的大脑里。这就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及其失败的原因，也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两种民族情感相互对峙的原因之一。由《书简》引起的争论持续数年之后，在欧洲发生的1848年大革命又为这场争论添加了新的燃料。俄国知识界的激进力量从欧洲大革命中看到了俄国新生的契机和希望，而其中的保守力量对西方式革命的提防和恐惧则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

《书简》只不过是根导火索，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这两种思潮的对峙在俄国由来已久，别林斯基曾称斯拉夫主义是有其“始祖”的，（В. Белинский 1948：720）赫尔岑也曾说，斯拉夫主义“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这是对

风行一时的外国影响的反抗，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须的时候就开始了”。（赫尔岑：1998：45）也就是说，自从俄国人有了欲与西欧人比肩的愿望之后，向东还是朝西的艰难选择就已经存在了。这使我们意识到，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种思想倾向的长期对峙，无疑有着一些更为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地理上的原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俄国虽然是一个相对后起的国家，但由于其所处的位置当时还是一个东西方文明都尚未充分侵占的区域，由于其历代君主都十分热衷于领土扩张，俄国的领土在几百年间不断扩大，迅速成为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但是，其文化的辐射力却似乎一时还难以统领如此庞大的疆土，俄国的文化也似乎难以在世界文化版图中形成独立的一“极”。于是，用“欧亚合体”（Евразия）来界定自我的俄国，既感受着一种地域广袤所带来的自得与自豪，同时也遭遇着文化的混杂所造成的迷惘和尴尬。俄国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既是东方也是西方，面对西方世界俄国就是东方，面对东方世界俄国又成了西方，但无论是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似乎都从未将俄国视为自己文化上的“同类”。所以，长期以来，俄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孤独而又滞讷地在东西两大文化板块间摆动。在文化身份上所面临着这种艰难的选择或取舍，长期承受着一种文化上的无归属感所带来的困惑，这必然会造成民族意识中的某种分裂。此外，展开俄国的地图，可以看到俄国疆土上的河流大都呈南北走向，在俄国文化发展、融合的过程中，这些河流可能是联系的纽带，同时也可能是阻碍的天堑。从文化的起源上看，俄国文化的南北差异原本也是很大的，作为一个欧洲后起的民族，古代俄罗斯分别受到了来自南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和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以及来自北方的日耳曼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南方的基辅和北方的诺夫哥罗德两个文化中心，然而，贯穿着这两个文化中心的伏尔加等俄国的大江大河，却逐渐地消弭了南北的文化差异，并进而突出了俄国文化的东西对峙。

其次是社会结构上的原因。与西欧诸国相比，俄国的现代社会制度形成较晚，在西欧已步入工业时代时，俄国还保持着农奴制度，这种使人压迫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合理化的不合理社会制度的长期存在，制约了俄国社会的均衡发展，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此同时，自彼得一世开始实行的全盘西化的国策，却迅速造就了一个“文明化了的”俄国贵族阶层，无论是就富裕的程度还是就教育的程度而言，俄国的这个贵族阶层较之于西欧诸国的贵族阶层都毫不逊色。于是，俄国社会中便出现了“文明的”贵族阶层和相对愚昧的农奴阶层并存的局面，俄国民族构成中这一分裂现象的存在，是俄国诸多社会矛盾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内在驱动因素，其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对峙，也是这一分裂状态的一个具体体现。

第三是宗教传统上的原因。罗斯在公元988年的“受洗”，原本被视为一个融入西方基督教大家庭的果敢举动，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也的确以宗教为中介联通了与欧洲的关系。在“受洗”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罗斯一直承认拜占庭教廷的权威，也一直自认为是拜占庭的“教女”。到了15世纪，拜占庭在受到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威胁时求助于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主动提议与天主教合并，于1439年在佛罗伦萨签署了宗教合并协议，但莫斯科教会却认为佛罗伦萨协议是对东正教的背叛。不久，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俄国教会认为这就是上帝对他们的背叛举动进行的惩罚，俄国教会从此自视为东正教的世界中心，由菲洛费伊提出的“第三罗马”（Третий Рим）理论得到空前的鼓吹，并深入人心，俄国教会中有一部分人认为，如今希腊人，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应该向俄国人学习了，而不是相反。此后，占据着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半壁江山的俄国教会，就一直坚持着这种宗教上的自我孤立行为，与整个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世界格格不入。教会的这样一种立场，也对俄国文化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后，是民族性格方面的原因。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民族，从别尔嘉耶夫到

利哈乔夫，许多俄国思想家都指出过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多种“矛盾”（противоречия）（Н. Бердяев 1990：10）和“极端性”（поляризованность）（М. Лихачев 1999：56）：俄国人是勇敢剽悍的，同时也是多愁善感的；是沉思默想的，同时也是躁动不安的；时而虔诚恭顺，时而又蛮横霸道；时而理性冷静，时而又感情用事……一个民族的性格当然不会是单一的，它必然是多种性格因素的组合，但问题在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两个极端间的距离显得太大了，摆幅如此之大的性格在世界其他民族中间是比较少见的，人们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篇小说的题目《双重人格》（Двойник）拿来概括这一现象。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存在着的这种二元对立，或者说是矛盾性格、双重人格，一方面，使他们在面临文化选择时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彷徨和摇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也为不同倾向的激烈交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体和话题。

诸如此类的深层原因还可以找出一些：比如俄国皇室的血统问题，由于公元 9 世纪起北欧的瓦兰人应邀入主罗斯，之后俄国和西欧皇族间的不断通婚，俄国的统治者常常具有西方血统（北欧或日耳曼血统），也就是“西方人”，以恭顺、忠君为美德的俄国人所臣服的却往往是这些“外国人”，其间的隔阂乃至冲突自然难免，俄国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义，都是打着驱逐“异族”的口号，这也就不奇怪了。再比如战争的因素，俄国与东西两个边境上的邻国一直战事不断，战争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交流”方式，会以一种强加的方式提供出对比，每一次战争，俄国无论是战胜还是战败，都会在国内引起激烈的思想反省和社会动荡，在俄国的历史上，战争往往不仅仅是“政治的延续”，而且还是政治的深化，是社会改革的起因，左冲右突的俄国，在与东、西方持续不断的碰撞中不仅没有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反而因为每每的顾此失彼而加大了选定朝向的难度。

上述这些原因，自身也许就是互为因果的，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正是这些直接的导火索和间接的因素、表层的原因和深层的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俄国人在东西方两种价值取向上长期的无所适从。

### 三

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的赫尔岑的那段话，是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关系的绝妙概括，此外，赫尔岑对此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说法：“友好的敌人，或者确切些说，敌对的友人。”（赫尔岑 1998：143）在这样的说法中，包含着怎样一种复杂、深刻的内心情感啊。传统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叙述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是两个你死我活、根本对立的两大阵营；而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充满感情的表述，又似乎能真的让我们把两派之争视为一场“家庭纠纷”。（赫尔岑 1998：191）其实，这两个印象都有可能是某种误读。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其复杂性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同属自由派的双方相互之间却展开了最为激烈的争论。19 世纪中期的俄罗斯知识界和思想界，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派别，即靠拢官方的保守派、主张变革现实的自由派和疏远现实的“纯艺术派”。前者以教育大臣乌瓦罗夫在 30 年代创建的“正教、君主制和民族性”的“三位一体”学说为理论基础；“纯艺术派”以旨在对抗“理性世纪”而出现在俄国的“唯美主义”美学为旗帜，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后俄国思想界急剧向右转的时代背景下，又进一步演变为“为艺术而艺术”派。处在官方和在野两大势力之间的，就是自由派，而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实际上同属于这一派别，差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温和的自由派”，一个可以称之为“激进的自由派”。在面对俄国的农奴制现实时，两派都持坚定的反对立场，作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两派人士都对社会的不平等表示抗议，对下层人民的疾苦表示出深刻的同情。作为俄国知识阶层的中间力量，两派都既反对不问现实的“唯美”，也坚决拒绝担当为沙皇及其统治大唱赞歌的官方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角色。但是，同属自由派阵营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相互之间却爆发了最为激烈的争论，原因之一，恐怕是他们双方有着最为接近的前沿阵地，如果把当时俄国社会中官方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和在野的、消极的意识形态看成

是两个圆圈，那么，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就似乎共同处于这两个圆的相交部位，两种或多种不同的社会态度在这里相遇，并发生激烈的碰撞。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正因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拥有某些共同的立场和话语，才恰好使得他们获得了对话的平台，他们棋逢对手，对于双方而言都是值得与之展开对峙和争论的对象；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彼此都是对方展开思想、发出声音的媒介。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他们不可能去与官方意识形态展开旗帜鲜明的抗争，而他们那些关于现实的诸多热切思考，也很难在唯美派那里激起什么热烈的反响。

其次，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相互之间的阵营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清晰。我们知道，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不是组织严密的团体，而只是一个结构松散的思想共同体，他们没有签署过什么纲领，没有颁发过什么会员证，这两个所谓的派别，实际就是两个围绕在某一理念周围的一群思想者。这就决定了，这两个派别的构成必然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总是永远一致的，两派之间的界限因而就常常是游移不定的，模糊不清的。需要说明的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开始了俄国历史上意识形态管制最为严格的一个时期，而1848年的欧洲革命，更使俄国的当权者进一步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道的革命派别及其声音是不可能公开存在的，它们被迫改头换面，加入自由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尼古拉一世当政后期的“昏暗的七年”（1848—1855）中，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主动脱离官方阵营，转而接近自由派。也就是说，除了死心塌地的御用文人和看破红尘的艺术家，各方高手可能都聚集到了斯拉夫派或西方派的旗帜之下，其构成上的复杂，直接导致了两派之间，甚至两派自身之中观点和立场的斑斓。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游离于两派之间的人物，看到了许多改换门庭的人物，看到了更多不断修正观点的人物。

第三，两派构成上的复杂，还导致了两派各自内在的不一致现象，无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方派，都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都存在着许多争论，有的争论就其激烈程度而言，似乎并不亚于两派之间的争论。有这样两件小事，能帮助说明斯拉夫派内部的一些纷争：康·阿克萨科夫为了标榜自己的斯拉夫主义立场，不仅留起了胡须，而且还换上了一身俄国古代的民族服装，可他的这种扮相却一直没有得到大多数斯拉夫派人士的肯定和模仿；诗人雅济科夫是斯拉夫派首领霍米亚科夫的亲戚，他从欧洲回国之后不久就加入斯拉夫派阵营，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写了一首言词十分激烈的诗《致不是我们的人》，没想到，此诗却引起了本方人士如康·阿克萨科夫等人的不满。而在西方派阵营中，有一些分歧则是原则性的，如别林斯基与被视作“自然派”首领头果戈理的书信论战、赫尔岑与西方派的公开决裂等。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在60年代初的逐渐平息，固然与他们共同的首要关注对象和争论焦点——俄国农奴制的被取缔有关，但无疑也是两派内部长期积累起的大小矛盾不断作用的结果。如果“内讧”过多，自然就难以集中精力对付敌人了；如果能在敌对的一方发现许多更为亲近的人或观点，此一阵营无疑就会土崩瓦解。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能给我们以这样两点启示：第一，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实际上是有同有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更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异而非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的选择，因为在争论的当时，当事人的双方关于“同”的表述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异”的强调才能凸现自己之观点的价值和意义，而在争论已成为历史的后世，较之于“同”，“异”则更能引起注意，也更能激起谈论、研究的兴致。但是，在关注“异”的同时也应该多少关注“同”，否则就有可能误读历史，在这里，就是有可能在感觉和印象中放大两派之间的鸿沟。第二，当我们在观察作为一个整体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一个总的思想倾向，一个相对一致的理论框架，而当我们面对某一个作家或理论家的时候，却往往难以把他完整地纳入某一派别的理论框架之中。身为西方派的卡维林曾说道：“一个真心把祖国利益挂在心头的人，就一定会觉得自己的一半是斯拉夫派，另一半是西方派。”（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2001: 384）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大作家，其

创作往往是超越某一流派的，其中也往往呈现出亦此亦彼的思想取向，具有某种不稳定性和模糊性，这就提醒我们，将某一家纳入某一流派有可能是危险的，而仅仅从某一流派的立场出发来解读一位作家，就有可能更加危险。流派可能是相对一致的，而流派中每一个个体却常常是无限丰富的。第三，那场发生在 150 多年前的争论，是一场真正的君子之争，争论的双方所体现出的率真和坦诚，捍卫真理的勇气，以及旨在造福民族和后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斯拉夫派萨马林在回忆当年的争论时写道：“两个小组在一切问题上几乎均无共识；与此同时，他们却又每天见面，和睦相处，似乎构成了同一个社团，他们相互依存，都具有那种建立在一致的智慧兴趣和深刻的彼此尊重基础上的相互同情。”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2001: 378）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充满变故，比如：1844 年 4 月 22 日，在阿克萨科夫家中曾举办了一次隆重的午餐会，正式宣布两派和解，两个阵营的人士相互拥抱，不少人都泪流满面；但是，到了这年年底，雅济科夫的《致不是我们的人》一诗又让两派拉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姿态，格拉诺夫斯基和基列耶夫斯基甚至要为此而决斗；1845 年 1 月，康·阿克萨科夫曾“含着热泪”与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绝交，但没过多久又重归于好……“和睦相处”中充满着争吵乃至决斗，绝交和谅解此起彼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争论是一场纯粹的学者之争，是一场智者的角力，一场由思想者们上演的精彩戏剧。

#### 四

在传统的俄国文学史中，往往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颇为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文学史家们会明确地指出，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对峙是 19 世纪中叶俄国文坛最为重大的文学现象之一；另一方面，在提到某些大作家、大批评家在这场思想对峙中的活动时却总有些躲躲闪闪，很不情愿将他们归入这一或那一阵营，比如，从不明说赫尔岑、别林斯基等是西方派，也不直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斯拉夫派。似乎，将那些 19 世纪俄国文学史中的大人物分别归入两派，就是太抬举了那两个派别。毫无疑问，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往往是超越狭隘的小集团意识和既定的派别纲领的，他们不会为任何理论的框框或团体的利益所束缚。但是，若将这些大家排斥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斗争之外，则难以真实地还原文学史的本来面目，也无助于对那些作家创作过程的贴切理解。其实，在这样的文学史态度中，隐含着一种抑此扬彼、一贬一褒的初衷，为了论证在此后出现的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高大，就必须让此前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理论显得相对渺小，一如在谈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和伟大时，总是要谈到之前的文学如浪漫主义文学等的消极和不足。这样一来，我们就感觉到，在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思想论争的历史评价中，似乎掺杂进了某些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进而意识到，长期以来，人们关于两派的思想对峙对俄国文学产生的影响，就可能有低估之嫌，对两派文学活动的成就和意义也许同样缺乏足够的认识。关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对俄国文学的影响，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它构成了 19 世纪，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一般认为，真正自立于欧洲文学之林的俄国文学，开始于普希金，但是于 1837 年初在决斗中死去的普希金，其创作的文学史意义并没有立即被其同胞所广泛意识到，实际上，直到普希金的第一座纪念碑在莫斯科落成时的 1880 年，普希金才被公认为俄国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俄国文学无疑是在 19 世纪 30 年代、也就是普希金及其同时代作家旺盛创作的年代成熟的，但是其公认的成熟时期，或者说是对其成熟的广泛认同时期，还应该是 19 世纪中叶，而这一时期最为重大的文学事件，恐怕就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了。如果说，在这场争论之前的俄国文学，还多少带有一些模仿西欧文学的痕迹，那么，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之中，俄国文学却获得某种强烈的自觉意识。谈到俄国文学自觉意识的建立，无论是在斯拉夫派还是在西方派那里，都有一个无心插柳式的情形：斯拉夫派反对西欧的理性主义，主张弘扬东方宗教中的直觉精神，但是，在他们对俄国古代文化的潜心发掘、对俄国文化民族特性的精心归纳和对俄罗斯

民族独特的世界使命的论证中，却又处处体现着一种强烈的理性色彩；西方派主张俄国走西欧的发展道路，但他们对西方文明却持有的一种清醒的认识，赫尔岑对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污浊的市民阶层”的鄙视（他还感叹道：“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1998：117），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而别林斯基对俄国语言的赞美、格拉诺夫斯基对爱国激情的肯定，在西方派中也并非个别现象。如果说，西方派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力主俄国走西欧的发展道路，那么，他们在文化和文学层面却都是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人，并将之视为俄罗斯民族在欧洲赢得身份和发言权的首要条件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将一种面对现实的理性精神引入了文学。就这样，两派不约而同地为俄国民族文学的建立出了力，使俄国文学初步具有了自觉的意识和独特的风格。可以说，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是俄国文化人追求理性的结果，是俄国文化人思想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它也是俄国文学走向理智和成熟的重要象征之一。

其次，两派的思想论争对于俄国作家而言无疑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思想温床。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19世纪中期几乎所有的文学大家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这场争论，换句话说，几乎每位大作家都经受了这次思想风暴的洗礼。如果说，无论是罗蒙诺索夫的俄语文体改造，还是杰尔查文的诗歌创作，都暂时还没有使俄国文学获得深刻的思想内涵，那么，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激烈争论的时候，俄国文学就开始全面地介入思想斗争了。如果说，普希金像西尼亚夫斯基所言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诗人”，他作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作家”，以其卓越的天赋使文学创作真正成为了一门“手艺”，一个“行业”，那么，只是到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摆开对垒的阵势之后，俄国文坛才第一次成为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中心。俄国文化中独特的“文学中心主义”传统在此时开始形成，在当时和后来的俄国，文学都不仅仅是文学，而是包含着哲学和宗教、艺术和科学、政治和思想的大文化，文学家也都不仅仅是文学家，而多为集写作者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哲人，具有社会代言人和未来预言者双重身份的先知。在当时的俄国，一方面是发达了的民族智慧在寻求施展天地的场所，一方面是专制制度对精神生活的束缚，于是，文学就成为了一个间接的喷口，一个折射社会正义之声的回音壁。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论争，本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之争，而是关于民族历史和未来发展道路的论争，可是，其争论的主体却大多为作家和批评家，其表达观点的形式也大多为诗歌、小说、戏剧、批评文章和政论文。文学家们并不以文学为一个藏身的象牙塔，他们很关注纯文学之外的社会思潮；而身为哲学家、神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乃至政治家和官僚，也总想到文坛上来一试身手，以图更为广泛地传播自己的“专业知识”。于是，俄国文坛就成了俄国思想的熔炉，成了各种俄国理念的角力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学和思想的联姻就发生在俄国民族文学刚刚确立自我之后不久，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这两种思想倾向的激烈斗争，不仅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为俄国文学之后的发展注入了不竭的思想活力，开辟了俄国文学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学传统。

最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论争也是俄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来源之一。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激烈论争的时期，也恰好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形成时期，两派的争论对于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以往的文学批评史中，对西方派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奠基作用多有充分、翔实的论述，详细地描述了别林斯基等以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等作家的创作实践为基础创建俄国现实主义美学的过程。但相对而言，对西方派的对立面斯拉夫派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估计不足，甚至将斯拉夫派的美学批评定性为“俄国浪漫主义美学的独特发展”，或“保守的浪漫主义”。（刘宁 1999：200、204）其实，斯拉夫派虽然没有一位别林斯基那样的批评大师（尽管康·阿克萨科夫曾被称为“斯拉夫派中的别林斯基”），但该派的批评家们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贡献至少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斯拉夫派始终持反对农奴制的立场，渴望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这使得他们也主张一种面对现实的文学，为自己的政治主张服务的文学，因此，霍米亚科夫称“真正的艺术



是生活的生动果实”，基列耶夫斯基认为普希金创作的特征就在于“尊重现实”，“在诗中再现现实”；（刘宁 1999：204-207）第二，斯拉夫派关注民众，将古朴的民间生活视为理想的社会结构，这使得他们将“人民性”的概念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甚至成了他们衡量文学作品之价值和意义的惟一标准；第三，他们对俄国文学民族特性的强调，对于建立有俄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谈到两派关于当时俄国文学的看法时，就不能不提到它们之间曾经爆发的两场激烈的文学争论：一次是基列耶夫斯基和别林斯基关于“自然派”的争论，一般认为，斯拉夫派是反对“自然派”的，但是他们反对的主要是“自然派”在面对现实时的虚无主义态度，以及在面对西欧文学时的“奴性”；一次是康斯坦丁·阿克萨科夫和别林斯基就果戈理的创作展开的讨论，阿克萨科夫在《死魂灵》中读到的是“朴实的、史诗般的直观生活”，而别林斯基读到的却是俄国的“生活败坏”和“被否定”。这些争论告诉我们，在关于俄国文学的讨论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分歧似乎不在于要不要反映现实上，而集中在反映现实的不同侧重点上。在面对不完善的现实时，西方派主张以西欧的当代社会模式为样板，而斯拉夫派则主张以俄国的古代现实为归宿，与之相呼应，在主张文学积极介入现实的时候，西方派主张以彻底的社会揭露来促使其变革，而斯拉夫派则主张以善意的道德感化来促使其进化，两派殊途同归，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论证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使俄国的文学从此不仅成为了一种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同时也成为一种入世的文学，干预的文学。关于俄国文学的理论争论，是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思想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两派在相互争论的过程中，广泛涉猎了与他们同时代的文学创作，提出许多新的文学概念和文学思想，丰富了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不约而同地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厦奠定了基础。

对历史的解读和评价总是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对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认知也同样如此。我们感觉到，这场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的思想大论战，如今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对而言，对其文化和历史意义的估价也越来越高。而在两派中间，斯拉夫派的立场又似乎得到了较多的认同。作为保守与激进、改良与革命、节制与放纵两种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代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得到不同的待遇，一般而言，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西方派的立场往往会赢得较多的喝彩，而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历史环境中，斯拉夫派的观点则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我们相信，随着对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研究不断深入，随着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俄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中地位的不断提升，它们与俄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对俄国文学进程的深远影响，都将得到更为深刻的揭示。

#### 附注

1 原文为“Житие”，又译《行传》。

#### 参考文献

- [1] Белинский В. 1948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3, М.
- [2] Н. Бердяев 1990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M]. М.
- [3] М. Лихачев 1999 Раздумья о России [M]. СПб.
- [4] Лурье Я. С. 1993 Переписка Ивана с Курбским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M]. М.
- [5] Плеханов Г. В. 1925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т. 1 [M]. М.
- [6]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От дворцовых переворотов до эпохи Великих реформ [Z]. 2001. М.
- [7] 亚·赫尔岑 1998 往事与随想（项耀星译）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8] 刘宁主编 1999 俄国文学批评史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9]维·佩列文 2001 “百事”一代 (刘文飞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Westerners and the Slavophiles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and Russian Culture**

LIU Wen-fei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eking 100732,China )

**Abstract:** The confrontation of the Westerners and the Slavophiles has a long history in Russ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it has very complicated reasons and far-reaching effec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s and history of this confrontation and tries to study the nature of two schoo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confrontation and Russian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West-East reciprocal model of Russian culture.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Culture, Westerners, Slavophiles

**收稿日期:** 2006-08-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编号 01BWW008)。

**作者简介:** 刘文飞 (1959 - ), 男, 山东菏泽人, 文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博士生导师,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俄国文学和文化。

**[责任编辑: 刘 锬]**